



李小龙

李英儒与野火风斗古城

人民文学出版社

光榮歲月

李小龙 著

李英儒与

野火风斗古城

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英儒与《野火春风斗古城》 /李小龙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光荣岁月)

ISBN 978-7-02-011163-3

I. ①李… II. ①李… III. ①李英儒 (1913 ~ 1989) 一生平事迹 IV. ①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3421 号

责任编辑 王永洪

装帧设计 黄云香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94 千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625 插页 3
版 次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163-3
定 价 31.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人民文學出版社



引子

我父亲在1989年，历经了100多天痛苦的疾病折磨之后，于3月6日凌晨，静静地咽了气。

3月7日，时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的王晓棠阿姨挥泪写就一篇祭文，发表在由我父亲晚年创刊并任主编的《八一电影》杂志头版上，她的文章原文如下：

你乘着春风去了。在午夜，你体贴地，连床边守护你的孩儿也没惊动，飘然起身，掠过北京三月春意朦胧的树梢，抚过天安门烈士纪念碑碑顶，拢半袖料峭春寒，揣满腹对尘世的眷恋，轻轻一叹，直上重霄而去……

你乘风而去既高且远，远行复远行。

春风当然要送你，只因你此生与春同驻。你待人和煦像春风，诲人细润似春雨；温厚比春日、文思如春潮。连你知名的小说和电影也取名为《野火春风斗古城》。我有幸在其间塑造了两个姐妹人物，由此结识了你。

你此番远去行色匆匆，我还未及告诉你：上月，加拿大国家电影局罗伯特夫妇来华选片，看此片后诸多褒奖，说它是一部各国观众都会接受的好影片。你的痴女小龙掩面低喃：“爸爸

要听到会特别高兴。他去得太快，太屈了！”面对你的两个娇儿和爱妻淑文，我酸楚却又宽慰，他们在极度悲痛中仍能庄重自持，显示出这个家庭的教养和品格。这是你留给社会的又一财富，也是你光华的折射。

春风当然要送你，只为你宠辱不惊的淡泊。得意时如斯，失意时也如斯；只为你不忘故旧的敦厚，鱼水乡情永记，贫贱之交不移。更为你的耿耿丹心，虽历尽苦难，信仰始终不渝。然而，我也有过忧虑，你过细了。过细，使你当年在敌占区做地下工作时化险为夷，也使你而今早生华发，一病不起。你为中华民族的兴衰长夜反侧，恨不能书尽人间不平事，唤起四海同此心。

你就这样乘风去了，携着你那支力重千钧的笔，直奔天路。从此，我将翘首仰望：当天际现出长虹，那就是你，是你在挥臂洋洋洒洒，为人间绘制七彩幸福之门！

作为全国知名的作家、书法家，我的父亲李英儒，他一生并非仅文学一条路。一个人的一生，当你看到他生命的终结，你才发现人类生存的寿命实在是很短很短，亲人故去带给世人的巨大悲苦中有一种哀怨几乎是共通的：为什么他不能再多活几年？

这种哀怨是无用的。

死亡，是人生绝对要遇到的一道深渊，你看到亲人到了深渊的边缘，却有手不能拉住他，有身体不能挡住他，眼睁睁看看他咽下最后一口气，飘然间连你的灵魂也随之而去的瞬间中，或痛哭或无语都无法替代你心底里的呐喊。

我陪父亲在医院整100个日日夜夜，眼睁睁看他走完人生最后这再也摆脱不了的巨大痛苦，欲哭无泪中，写完了以下全文。

目 录

引子	1
家庭会议	1
停课的日子	7
大串联	20
大字报	47
专案组	67
爸爸被抓走了	79
流亡生活	98
审讯	108
秦城监狱	138
十块大洋	150
敌工部	159
四面楚歌	164
过大年	170

创作的日子	182
思想铁闸	201
联动	208
出国手记	216
真相大白	220
出狱	226
农场劳动	232
疯子	239
回家	243
创作问题	250
爸爸的“城”	261

家庭会议

6月1日是国际儿童节。可是30年前的“六一”，却是新中国成立后历史上一个极不平常的一个“年代”的开端。

那是1966年的5月31日，我同许许多多大人一样，于当晚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中收听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大字报。第二天，1966年的6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并且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

如果说这天是“文化大革命”熊熊烈火真正点燃的日子，那么，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了一个通知，这个通知则是“文化大革命”这场浴血之战初吹的号角。《通知》是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它给了当时北京市市长彭真、副市长吴晗无法承受的一击。这个通知是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

印着红头的文件放在爸爸的床边，爸爸从总政参加学习回来就反复琢磨这份文件。一遍又一遍地把味着“五一六”通知的意义。

爸爸把我们在家的4兄妹叫到一起，召集了一个“家庭会议”。

我至今不忘的是爸爸从始至终没有展露过一次笑容，这使我在30年后仍然清晰地记得“五一六”通知的几则内容：

“中央决定撤销原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原五人小

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实际上是彭真一个人搞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和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还没有被识破，例如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懂吗？”爸爸扫视我们几人一眼后问道。我当时立刻懵里懵懂地说“不懂”。我没有想到，从此以后，竟有十年的时间足以让我由不懂变成刻骨铭心的伤痛。爸爸也想像不到，这是一场“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大革命，理应包括当时尚属儿童的我。爸爸目光盯着哥哥和姐姐说：“这只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回合，党内运动我经得多了，我看没有比这次声势更浩大的。”那时哥哥上高三，姐姐在初三，小哥刚进中学，我正准备参加升中学的考试。

姐姐问爸爸：“那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谁？”

爸爸皱着眉头说：“你们不要到外面去说，好好复习功课。”

姐姐笑了：“所答非所问……”

1966年5月25日，我还在小学校的课堂里抄写一大篇一大篇升学考试的复习题，那份由聂元梓领头签名的、题目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掀起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这份向学校当局提出挑战的大字报写着：现在全国人民正在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

这种激昂的言词样式在以后几个月乃至若干年中不断地使用



授衔照

和发展着。这是大字报所产生的结果之一。

而更重要的结果是《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份大字报，同时发表了赞扬的评论，它写道：“北京大学广大师生的反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革命斗争，一定能够胜利。”我那时也不知道北京大学——我心目中的最高学府怎么就成了“三家村”黑店的一个重要据点，还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多年后，我和陆莹（原北京电视台总编）说起当年，才知道她们兄妹经受了常人想像不到的迫害。什么“顽固堡垒”啊，连家人都失去了保护，成了任人踩在脚下的碎砖烂瓦！

6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社论号召：“坚决向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展开坚决的毫不留情的斗争。”要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后两个月的红卫兵小报曾写过：“社论的春风一夜吹绿了所有校园。”更有嫌这种比喻缠

绵无力的提醒道：“战鼓已敲响，炮口直指反革命黑帮，轰！轰！轰！”

从那个年月起，我就懂了，社论是政治的风向标。

当高音喇叭颂扬着自己的威力，你终日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播音员那种铿锵有力、字正腔圆的播送，声潮时刻撞击着你的耳膜，在这种迅速强化的普及教育下，不由得你不卷入这场政治运动的旋涡中去。

北京各大院校在几天之内，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糊满了校园，学校的教授和领导最先当上了“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

哥哥是铁道学院附中的学生会主席、团总支书记，是学校几年来重点培养的党员苗子。他对爸爸说，学生中很多人砸课桌、椅子、黑板，拆毁、捣烂了学校公用设施，对教师的人身攻击也越来越凶。“革命”伴随着极大的破坏性，看来停课势在必行。校领导和党总支找哥哥谈话，希望学生会劝阻学生的过激行为，他刚刚向学生会和团委提出这些要求，立刻有人说他是“保皇派”。爸爸听完说：“不怕，你有群众基础，遇事先不急于表态，多学习，掌握局势变化。”

停课，大学停了中学停。6月份，我的升学考试终于在满街都是大标语的运动气氛中消失了。起初听到不用伏案做题，我感到一阵激动，高兴得和同学们一起在学校操场上跑起来。操场的西边竖立着宣武门教堂的一面墙，它也是校园的一面围墙。我们把书包抛向天空，想扔到教堂高墙上的玻璃花窗那么高，窗户上的五彩玻璃闪闪发亮、耀眼夺目……我大唱起“拿起笔做刀枪”的歌子来，一路踩着音乐点回到家中，我喜悦地告诉爸爸：“不用考试了，不上课了！”我像翻了身的奴隶一样，在屋子里大步走来走去，“怨不得穷苦人民盼解放，我自由了！”然后又引吭高歌“翻身农奴把歌唱”，并随之手

舞足蹈起来。

爸爸却像看着一只不认识的小怪物似的盯了我一会儿，问道：“你不遗憾吗？”

我停住脚，也为自己少有的狂喜感到几分难为情。爸爸说：“你不可惜？譬如说我手中的文章已经铅印了，修改三稿就要印刷成书了，突然接到通知说：书不出了。你的毕业成绩那么好，再考一次你会考进一个很好的学校，按部就班地读书，我指望你一直读进大学，读进北大！现在全成泡影了，你还很高兴？！”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很窘。爸爸见状说：“好了，好了，我不是说你，不上课了，我给你和你小哥买个月票，你们到大街上和各个学校去看看大字报、看看‘运动’是怎么回事。”

我听了这个安排比过年还兴奋，整天不学习，还要到处去“玩”？这一天，我简直以为到了幸福的顶峰。

爸爸却无奈地放下了手中大本的铅印稿，这是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大地春》。这份稿子已有两年的审查和修改经历了，几经总政文化部讨论、评议，终于打出了清样（这部小说于“文革”后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为上、下册出版，书名为《还我河山》）。这部《还我河山》是爸爸作为专业作家认为写得最好的一部书，内容十分丰富，抗战的生活扑面而来。爸爸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战斗在滹沱河上》完成于1954年。小说出版后，被翻译成日文、英文版发行到海外。根据小说改编而成的单行本《沿河村的血迹》也颇为畅销。这部描写抗战的小说，创作手法十分朴实，生动曲折的故事和塑造鲜明的人物引起了许多专业人员和出版部门的注意。

1959年，爸爸出版了第二部反映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该小说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建国十周年来优秀创作

作品”成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10 周年的一份贺礼。这部小说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小说被改拍话剧、评剧等多种剧种上演。大鼓书、曲剧和单弦中“杨母跳楼”的段子广为流传。马泰扮演杨晓冬，魏喜奎、喜彩莲等均扮演主要人物。“文革”中，马泰还经常来到我家小院，和爸爸多次见面，虽然在“文革”中大家的服饰趋于统一，但马泰穿的布中山装，脚登的一双平底布鞋，都掩饰不住他风度翩翩的神采，饰演“杨晓冬”那样我党的地下工作者，确是十分合适。评剧《野火春风斗古城》也成为马派流传下来的剧目之一。《野火春风斗古城》连环画的绘画者洪钊获得了全国连环画创作奖。1964 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将小说改编为电影，严寄洲任导演。王心刚扮演杨晓冬，王晓棠扮演主要人物金环和银环，王润身扮演关敬陶，陈立中扮演杨母。王晓棠因一人成功地扮演了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姐妹，获得了当年“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可就在颁奖之际，“文化大革命”到来，百花奖评奖取消了。

爸爸停止了写作。

我当时不能体会他的痛苦。

停课的日子

停课的最初阶段，姐姐带着我和小哥一行仨人每天一大早就乘车到府右街国务院办事处看大字报。我11岁，小哥不过13，姐姐则刚满14。我们都煞有介事地拿着小本子记录。我们跑了师大女附中、一〇一中学、财经学院、气象学院等许多院校。

不久，哥哥和姐姐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爸爸拿起袖章左看右看，最后套在自己胳膊上在院中散步。哥哥翻箱倒柜找出几套黄军装在身上试穿，姐姐也同样效仿。妈妈观赏着他们试换衣服，不免有点遗憾地说：“这都是我保存多年的，你爸爸缴获鬼子的皮大衣我都送人了，我们自己的军装可没舍得给。”妈妈不高，有1米64左右，在那个年代，也算得上是高身材了，这和她从小没娘，在滹沱河岸撒着欢疯玩有关。她的家是抗日根据地，妈妈12岁就当上了儿童团长，16岁入党，她跟着大部队打过游击，也隐蔽到日伪占领的城市当过地下交通员，还背着孩子为党做机要秘书工作。妈妈有个灰布皮的军官转业证。我从小就听过她对转业的种种抱怨。逢此，爸爸便说：“你好好照顾家和孩子们，我不是还在部队吗？你就把为我们服务看成是为军队服务吧。”我觉得这话好像有点自私，深爱爸爸的妈妈却浑然不觉，于是，爸爸几百万字的小说，便都是妈妈一字一字抄出来的。

爸爸看着穿上军服、戴上红卫兵袖章显得威风和英俊起来的一双儿女，禁不住拍拍哥哥的肩膀：“你们要是当兵，还真有个样子。”

姐姐笑着说：“我会当上兵的，你等着瞧！不过，哥哥现在不是兵，他可是官了。”“什么官？”爸爸半眯着眼问。

哥哥有点不好意思：“没什么，学校拟定成立文化革命运动委员会，由革命教师、红卫兵小将和校工联合组成领导班子，我被选在班子里了。”

“在班子里？”姐姐摇摇脑袋，满头乌发闪着缎子般的光，“又不是在戏班子，干嘛说得这么扭扭捏捏的。”

爸爸则凝神问：“你的分工是什么？”哥哥稍一讷，姐姐立刻抢着回答：“他是革委会主任！”

“是吗？”爸爸问，哥哥点点头。

“还不相信我，我听他们同学说的。好像我骗你们似的！”姐姐笑着说。爸爸假装嗔怪地“喝斥”了一句：“小壶易热！”接着转向哥哥说：“学生当正职？那革委会副主任是谁？”

“是校党委书记。”

“真是本末倒置！”

“不是我想当，是全校选举，我的票数最高。”

“那是一定的，学生的基数最大，你的票数当然就比教师高，这不能说明你就应该当。”

哥哥并不着急地说：“这我知道，我找了老师和书记，他们告诉我，选举前都商量过，他们认为我在革委会里是最理想的人选。他们也都投了我的票。”我们确信这个情况，没有“文化大革命”，哥哥必定算是学校培养的接班人，他的师生关系极好，校领导在“文革”之初，事事都和哥哥详细交流，仍旧在要求哥哥做好全校学生工作，



1949年春寒料峭，父亲从郊区十渡赶到已被解放军围城的北京参与谈判，左为父亲

他们曾说，我们现在说话不顶事了，你要管好他们。哥哥也始终和造反派划开了一条明确的界限。所以，后来学生运动发展变化最快的阶段，有人说哥哥是“保皇派”，坚决号召学生反对他当学生领袖。幸好哥哥充满徐霞客的游历精神，卷上行李，遍走祖国山河去了。直到今天，他这“精神”不改，在跋涉边远荒僻地区的旅游区中的游客里，年龄最大的就是我哥哥。

爸爸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还是辞了，坚决辞！要当也只能当副的。”

哥哥说：“我也是这么想的。”

姐姐可要跳起来了：“嗬！我们学校高中好几个红卫兵领袖都在抢着当革委会主任。为这，每天在学校用大喇叭讲演拉选票，咱们家还有让的！我要是高三的学生，我绝不……”